

老慧子◎著

高古  
陶瓷

# 佛 造像



中国书籍出版社



老慧子◎著

高古陶瓷

# 佛造像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高古陶瓷佛造像/老慧子著.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068-2087-5

I. ①高… II. ①老… III. ①陶瓷—佛像—中国—古代—图集 IV. ①K879. 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61877号

责任编辑 / 金硕 牛超

责任印制 / 熊力 孙马飞

封面设计 / 中视天骄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2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 sina. 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睿特印刷厂

开 本 /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 14. 5

字 数 / 300 千字

版 次 /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238. 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言

年轻时，曾经不只一个人说过我有佛相。他们在悄悄地端详我一阵之后，一般都会这样说：看你天庭饱满，方脸大耳，慈眉善目，相貌端庄，真有佛相……我知道这是在夸我，但也只是一笑置之。

如今，沧桑尽度，炎凉饱尝，身虽尚健，发已苍苍，可惜再也没有人说我有佛相了……

对现实不敢奢望之后，开始迷上了古人的遗痕，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终至把温暖温馨的家，变成了拥塞冷寂的库。终日默默面对着积压在陋室里的一堆堆远古泥土，既为自己的藏品甚丰而暗暗自傲，又为这珍稀的宝物久遭冷落而怅怅落魄。冥冥中，总觉得应该找个缘由让它们继续发挥余热，于是将众多的古瓷分门别类，筹谋设计了几个系列主题的作文计划，并一拖再拖地着手为各个选题做资料与实物准备。

第一个创作纲要要做唐绉胎的研究。在为第一篇作文寻觅更多的实物佐证过程中，也许是精诚所至，也许是前世有缘，我有幸见到并请回了一尊精美珍贵的、高达82厘米的唐代白釉观音菩萨立像。

怀着如佛教僧侣浴佛时的虔诚心态，我小心翼翼地在水池边躬腰清洗了将近三个小时，才为她一点一点地刮刷洗刷掉千年的泥垢。清洗完后，想把她捧起来放到窗台上擦拭时，才发现自己的老腰已酸麻得几乎直不起来了。

当时，我只是出于收藏习惯，对购回的每件古瓷都要仔细清洗干净。后来读了大量的佛经后才了解到：洗浴佛像原来还可“得福无量”呢，但愿如此吧。

“佛言：人身难得，佛世难值……诸善男子善女人，于佛灭后，当至心念佛无量功德之力，浴佛形像，如佛在时；得福无量，不可称数；诸天龙神，常随拥护。”（《灌佛经》）

这尊远古观音菩萨的降临让我暗自惊叹了很多时日。

一是因为她确实太美、太美了，美得难以描述，任何华丽的辞藻在此刻都显得苍白无力。

再一个原因就是：她竟然真的是一尊唐代的陶塑佛像！无论是从此尊釉陶造像的胎体质地、釉料发色、成型工艺、烧制特点以及艺术风格、时代特征等诸多角度去审视分析，都可印证论定她是当之无愧的唐代陶工的经典杰作。

而在发现此尊塑像之前，不仅是我，当下很多的古陶瓷爱好者们，可能谁都没有亲眼见过、没有听说过唐代的陶塑佛像，甚至都很少能在历代的典籍文字中见到过有关的记述。试想一下：流传至今的唐代石质或金属材质的佛像已数凤毛麟角，偶尔见到，即觉有缘有幸，被奉为宝中之宝。而用泥土烧制的陶塑佛像由于其自身材质的脆弱易碎，早已在历代毁佛灭佛的浩劫中、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重归泥土了。几年来，经过大量查阅检索，我从未在任何文字或音

像记载著录中看到唐代的陶塑佛像公诸于众，世界上任何博物馆及各地各代私人收藏家也没有披露过一件此类藏品。

民间有句俗语的大意是：当缘分来临时，你挡都挡不住。而我的高古陶瓷佛造像收藏也正是如此；前世虔诚，今世因缘；精诚所至，诸佛亲临现身。

佛像相继降临陋室，眼前的谜题也逐渐增多，为了释解自己在探寻考证时遇到的一些迷惑，我开始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这一未知的领域。同时，由于拥有了较多的高古陶瓷佛造像珍品，也由于众多的古陶瓷佛造像拥挤在陋室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就暂时放下第一项唐纹胎专题的研究与准备，转首捧起了佛经，转身做起了高古陶瓷佛造像的文章。

早年学马列时，经常被告诫要认真研读“原著”，以免因他人的解说歪曲失真而被引入歧途。既然选择了佛造像题材作论述，必然就要在佛教典籍经卷中做一番考证，去寻找一些原始论据来充当自己的判断依据。这时我才惊愕地发现，佛教经卷竟是如此地浩瀚广博，任何个人即使穷尽一生时间，也难以悉数翻阅浏览。由此，竟情不自禁地对佛教理论体系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对历史上那些不辞辛苦传播教义、不畏险阻去求取经卷、不计得失地翻译佛经、不遗余力续写经传的大德高僧们充满敬意和崇拜。这种崇拜是发自内心的无功利景仰，如同崇拜“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革命先烈一样，真诚而又纯净。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有个著名的论段，“在进入个别的事实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有一个一般的概观，不然，我们就会只见部分而不见全体，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这种观察研究事物的方法，对解读古陶瓷佛造像来说，也应是非常适用的。

我虽然知道自己此生已注定不会再为任何教义而费神移目了，但是，面对这些一千多年前遗存下来的远古佛造像，面对着历朝历代制陶工匠们呕心沥血的绝世之作，我还是一头扎进了佛教经卷的浩瀚海洋中；我还是愿意捏着放大镜去探寻古物、古籍的蛛丝马迹，再戴着老花镜把一个个字词敲打成文；我还是愿意把她们当成精美绝伦的古陶瓷艺术品介绍给世人。毕竟她们曾经历的落魄磨难让我这个饱享辛酸坎坷的凡夫俗子亦长怀慨叹，毕竟我与她们有缘在公元二十一世纪的初年邂逅相聚。

# 目 录

## 前 言

第1章 佛造像溯源 .....	1
第2章 佛教传播历程与佛造像兴衰 .....	10
第3章 古陶瓷与佛教艺术题材 .....	22
第4章 南北朝青釉双面浮雕释迦牟尼佛坐像 .....	31
第5章 唐白釉佛祖乘白象 .....	45
第6章 唐白釉三世佛立像 .....	53
第7章 唐纹胎释迦牟尼佛、多宝佛像 .....	62
第8章 唐纹胎卢舍那佛首 .....	70
第9章 唐白釉菩萨像 .....	77
第10章 唐纹胎菩萨头像 .....	98
第11章 唐纹胎菩萨坐像 .....	103
第12章 唐代印度风格菩萨坐像 .....	109
第13章 唐纹胎天王俑 .....	116
第14章 唐纹胎四大天王俑 .....	126
第15章 唐纹胎十八罗汉像综述 .....	133
第16章 唐纹胎十八罗汉像赏析 .....	141
第17章 唐纹胎功德罗汉组像 .....	184
第18章 五代瓯窑青瓷自在观音像 .....	193
第19章 宋金定窑佛教艺术造像 .....	196
第20章 辽金时期月白釉释迦牟尼佛坐像 .....	207
第21章 元青花釉里红送子观音像 .....	212
后 记 .....	222



## 第 1 章

# 佛造像溯源

佛像是以佛教僧侣的思想信仰为基础，按照佛教所特有的尊像崇拜礼仪和宗教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佛像是古往今来出家人与世俗人们虔诚供奉顶礼膜拜的法物，是佛教神界人物在现实中的化身。

佛祖的崇拜及佛像的制造经历了一个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在古印度的原始佛教初创时期，是严禁以人的体态来表现佛祖形象的。其主要原因是释迦牟尼生前重视自我修养与自我完善，他珍视一切生命权利，倡导人人平等，反对祭祀，不拜偶像。在释迦生时，他与弟子同吃同住，一起修行，一起探讨，一起去传教，正所谓“吾在僧数”，表明释迦也自认是众比丘之一。再一个原因是，在佛教创始初期，在早期弟子信徒们心目中，佛是至高无上的，是不可以用世俗的形象来替代表现的，佛教徒们不敢用现世中肉眼可见的物体去直接表现他们所敬仰的佛祖。在《增一阿含经》等佛教典籍记载中可以了解到：早期的佛教信徒曾坚定地认为“佛形不可量”，“佛容不可测”。如果以人的形态摹画佛祖的形象，就是对佛最大的冒犯。在《阿育王传》中甚至记述了一件阿育王因听说尼乾陀弟子画佛像而将其捉来杀头的事情。由此可知释迦牟尼是存活在信徒们心中的圣洁的天神，是任何世俗物象都无法描记替代的。

公元前486年（一说前473年）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即使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佛像也没有出现。那时弟子们对佛的崇拜物主要是以供奉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宝塔为寄托的。“斂舍利，于四交道，起塔立刹。”四交道即为四衢通道，类似今日的十字路口，在四交道中建塔主要是为了使信徒便于见到，于如来“生恋慕心”，并由此启发信众信心。

如今在印度留存最早的起源于佛塔的石刻画像，展示出寄托人们哀思的只是佛的脚



古印度毘舍离城的阿育王石柱



印。佛陀弟子对于佛陀的怀念，是深深存在于内心的，是一种纯洁的宗教情操，通过对佛祖遗迹多方面的追悼，借此抒发内心的思慕。比如，在佛足迹外，信徒拜祭的还有法轮、菩提树、莲花等。当时盛行的是信徒们对释迦牟尼遗迹的崇拜，而非尊像崇拜。在佛教徒的观念中，佛陀不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佛教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无神论，而佛教的最终目的也是普度众生“成佛”，即通过圣僧普法传教、通过僧众的潜心修行，“人人皆可成佛”。

据《泥洹十诵律经》、《菩萨处胎经》、《阿育王经》等佛教典籍记载：佛祖涅槃火化后，波波国、遮罗颇国、罗摩伽国等八个国家的兵将来到婆罗门，讨要佛舍利。他们说：“佛是我师，我之所尊……故从远来，请舍利分，还国起塔。若分与我，举国宝重。”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较量后，婆罗门人把佛舍利分成八份，“使处处人民皆得供养”。

如今在印度及亚洲的大地上还屹立着很多的佛塔，而那些供奉佛祖舍利的塔是由无数虔诚的佛教僧侣信徒们历尽千辛万苦相继建造的。不过，在佛教典籍中却把建造佛塔的功劳归结为阿育王。

在《阿育王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述：“王得信心，问道人曰：‘我从来杀害不必以理，今修何善，得免斯殃？’答曰：‘唯有起塔供养众僧，救诸徒囚，赈济贫乏。’王曰：‘何处可起塔？’道人即以神力左手掩日光，作八万四千道，散照阎浮提。‘所照之处皆可起塔。’今诸塔处是也。”

为了建造舍利塔，阿育王派遣兵将到各地取回了所有的舍利，“时王欲建舍利塔，将四部兵众至王舍城，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还……如是更取七佛塔中舍利。”

带着舍利回国后，他就下令工匠制作宝函，分装舍利。“还国，造作八万四千宝函，分布舍利遍此函中，复做八万四千宝瓶，及诸幡盖，将诸幡盖付诸夜叉，于阎浮提一切地乃至大海处起塔。先咨耶舍罗汉，云：‘欲于一日一念中起八万四千塔，令一时俱成。’耶舍罗汉甚相赞美。”

“……十五日正食时，令此阎浮提一时起诸佛塔。如是依数，乃至一日之中，立八万四千塔。世间人民，兴庆无量，共号曰：阿育王塔。”

“八万四千”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在这里更像是一个数据概念的形容词。而在佛教典籍中，也把这个数据归结为佛祖自己提出来的。据《贤愚经》记述：“阿难白佛：‘先何因分身舍利，起八万四千宝塔？’佛言：‘过去有国王名波塞奇，领阎浮提八万四千万国。时世有佛，名曰：弗沙。王与臣民供养与佛及比丘僧。王念言边陲小国、处所偏僻人民之类，无由修福，即召画师图画佛像，分布远国，咸得供养。……波塞奇王调和众彩，自手画像，以为楷模，诸师写学，画八万四千像，分布八万四千小国王，皆得供养。波塞奇王今我是也。缘此功德，身有三十二相，涅槃之后，得八万四千诸塔。’”

释迦牟尼涅槃火化后，虔诚的信徒们捧着佛祖的真身舍利从拘尸那迦徒步跋涉，远赴四面八方，在亚洲广袤的大地上建造了数量众多的舍利塔。至于这些塔的实际数量是多少？却早



已成为千古谜题。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人能准确地统计出来，而且由于历史踪迹的缺失，以后也很难有人能够准确统计出来。

佛教徒们对佛的敬仰是非常虔诚的，那些没有分到舍利、无从建造舍利塔的地方，教徒们则愿意以焚烧佛指遗体处的炭灰作为供奉的圣物。“波罗延那婆罗门居士复言：烧佛处炭与我，我还本国，起为炭塔。衡国异道士求取地灰，还国起塔。”

“塔”这种建筑形式的起源在古印度有多种传说，其流传较广的一种传说是：释迦牟尼在世时，有一名叫从毗舍的弟子问他，佛祖涅槃后，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表达对你的怀念呢？佛祖遂将身上披着的一方袍平铺在地上，把化缘用的钵扣在中央，最后又将手持的锡杖立于覆钵之上。这个模型就是塔的最初最基本的蓝本。

在《涅槃经》中有关于建塔形制的描述。“阿难白佛言：‘佛涅槃后，当于何所荼毗如来？’佛言：‘可于拘尸城外。’复白佛言：‘荼毗已讫，当于何所起塔？’佛告阿难：‘当于拘尸那伽城内，四衢道中起七宝塔，高十三层。上有相轮，一切妙宝间杂庄严；一切世间众妙华幡而严饰之。四边栏楯，七宝严饰。一切装铍，靡不周遍。其塔四面，面开一门，层层间次，窗牖相当。安置宝瓶如来舍利，天人四众瞻仰供养。’”

而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中，佛陀讲解塔的形制时，内容也大同小异，“佛言：应可用砖，两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钵，随意高下。上置平头，高一二尺，方二三尺，准量大小。中竖轮竿，次着相轮；其相轮重数，或一二三四，乃至十三。次安宝瓶。”

释迦牟尼涅槃火化后，尸骨变成击之不散的彩色结晶，梵语称“舍利”。佛陀的弟子们便按照佛祖授意的样式，建造了一个与当时印度流行的住宅形式相仿佛的高大建筑，并将佛舍利置于其中。在梵语中对这个样式的建筑称为“Stupa”，巴利语则称为“Thupo”，这个词后来演变为“塔波”，或干脆就简称为“塔”。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信徒们也把佛的遗物、经书、舍利等带向各地，当地的人们为表示景仰，同样建造起类似的建筑保存这类遗物。于是，佛塔就成了佛教界特有的纪念碑，并且在沿袭发展中融入了各地民众的地域风尚、审美情趣和建筑个性，使塔的形式与特色变得异彩纷呈起来。

这些高耸出大地的塔由于存放着佛祖的真身舍利，而被冠以“宝塔”的美称。即，“有舍利者名塔，无舍利者名支提。”这些舍利塔顿时成为各地佛教徒心目中的圣地，是他们对佛顶礼膜拜的场所，是精神慰藉的景仰寄托。而教派领袖们以塔为轴心，广聚信众，形成了一个个礼佛敬佛，烧香诵经的佛教道场。在佛教典籍中记载更为神奇的是：为了满足信徒们的痴迷崇拜，涅槃后的佛祖甚至亲临现身，为塔作礼。如，在《金光明经》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有七宝塔从地涌出，佛从座起。为塔作礼。时道场菩提树神问曰：‘如来最胜最尊，何缘而礼此塔？’佛答曰：‘……时有全身舍利在此塔中，因是身早成佛道。’使阿难开塔取舍利，示此大众。阿难启塔，开七宝函，舍利红白。佛言：‘是戒定慧之所，勤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大众欢喜，恭敬顶礼。”



“塔”在早期佛经中还有“塔婆、翠塔波”等译词。而塔的梵语基本意思是，“瘞佛骨所，名曰塔婆。”

“塔”这个字出现在汉语中，大概是公元一世纪左右，由当时翻译佛经的僧侣依照梵文的近似发音创造出的专用汉字。塔字的象形意义就是埋葬遗骨高垒起的土石建筑物。《说文》中对塔的解释是：“西域浮屠也，或七级、九级，至十三级止”。

而佛教广泛传播后，对塔的解释就更加汉化了：“依如唐言：方坟冢也。古者墓而不坟；坟谓加土于其上也。”

这个意义在佛经《四分律》与《五分律》中也有使用，“如来知地下有迦叶佛舍利，以土增之，斯即塔婆之相。”

至于佛教信徒们是何时开始为佛祖释迦牟尼造像的？佛的弟子中又是谁最早为佛造像的？在佛教典籍中的记载不尽一致，一说是优填王，一说是波斯匿王。

在《阿含经》、《作像因缘经》等记载中最早为佛造像的是拘翼国的优填王。“舍卫国波斯匿王及拘翼国优填王至阿难所，问：‘佛在何所？’阿难答曰：‘我亦不知。’二王思诸如来，遂生身疾。优填王即敕国内诸巧师匠，以牛头栴檀作如来像。举高五尺。优填王问佛曰：‘如来灭后，欲作佛像，恭敬承事，当得何福？’佛言：‘若作佛形像者，世生处身体完好，后死，得生第七梵天，复生上胜诸天。端正无比，常生豪贵家，气力超绝，众人爱敬，财富无量。或生转轮王飞行天地；或生孝从道德之门，死不入三塗。’”

在《观佛三昧经》也有类似的记载。“佛升忉利天，优填王不胜恋慕，铸金为像。闻佛当下，以象载之仰候世尊，犹如生佛。乃遥见佛，足步虚空，蹈双莲花，放大光明。佛语像言：‘汝于来世大作佛事，我灭度后，我诸弟子咐嘱于汝，若有众生造立形象，种种供养，是人来世必得念佛，清净三昧。’佛告阿难：‘持我语遍告弟子，我灭度后造佛形像，相好，具足，亦做无量化佛，及画佛迹妙系及颇梨珠安白毫处，令人见之心生欢喜，能灭百亿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

得知优填王为佛造像的事情后，与优填王一起到阿难那里寻佛的波斯匿王也即诏召集能工巧匠，铸造了一尊大铜像。“时波斯匿王闻优填王作如来像而供养之，复召工巧以紫磨金铸如来像，高于五尺。时阎浮提内始有二像。”

按照上面的顺序推理，应该是优填王最早为佛造像，而波斯匿王听说之后，才开始为佛造像。但是，在《外国图记》却有这样一段记述：

“佛上忉利天为母说法经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见佛，刻牛头栴檀作如来像，置佛坐处。佛后还，如精舍，像出迎佛。佛言：‘还坐。’曰：‘吾般泥盘后，可为四部众作法式。’像即还坐。此像最是众像之始，后人所法者也。”

按照这个说法，又应该是波斯匿王最早为佛造像的了。



上述记载都出自佛经之中，它既可作为史实的佐证，也带有很强的神话传说因素。而时至今日，我们也没必要深究了。

据研究佛教史的专家学者们根据史料及考古发现分析推断：在现实中，最早的佛造像应是公元一世纪左右在印度出现的。如此模糊推断的原因是：印度这个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创造出无数光辉灿烂古文明的地区，也同世界上其他几个文明古国一样，没有留下可供考证的绝对年代记录。

而促使早期佛教信徒突破造像禁忌的是希腊文明。

公元前338年，18岁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之子亚历山大协助其父在阿罗尼阿打败了雅典、西布斯的军队，称霸希腊。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继承王位。随后，开始大举征战杀伐。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军进入小亚细亚，于伊苏城下大败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后，南进叙利亚，攻占腓尼基，继而占领埃及，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了亚历山大城。公元前331年，希腊人开始进军两河流域，他们势如破竹地连下苏萨、波斯波利亚斯，宣告了波斯帝国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覆亡。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率军踏过阿富汗的喀布尔，东征印度。当希发西斯河（今印度比亚斯河）畔也纳入了亚历山大的版图时，这位年轻的征服者开始忧虑自己的疆域过于辽阔了，于是诏令鼓励部下的军官士兵与当地女子通婚，希冀占领者与被占领者的血缘关系能够长久维系帝国的统治。可惜，公元前323年，32岁的亚历山大命丧巴比伦，顷刻间，整个帝国随即崩溃瓦解。不过，留居在印度河旁的希腊后裔们，却把他们举世卓绝的石刻雕塑技艺传承奉献给了这个信奉佛教的国度。

在当时印度贵霜王朝统治的犍陀罗地区，由于长期经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佛教信徒们逐渐认同了希腊神话中人神合一的理念。古希腊的能工巧匠利用爱琴海边优质的大理石，建筑起辉煌的神殿，雕刻出众多的神像，至高无上的神由一座座精美的石雕塑像所代表，既可以强烈地震撼冲击人们的视觉与心灵，又可以形象化地寄托人们的崇拜与敬仰。基于这一认识的逐渐形成，佛教信徒们对佛的热爱通过形象化的表现如喷涌般爆发流露出来，因此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在犍陀罗地区出现了佛教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造像运动。这一做法逐渐蔓延，随即在秣菟罗（今新德里东南一带）的土著民族区也打破了原始禁忌，开山凿石雕刻佛像。希腊文明的渗透促使古印度这两个地区的造像艺术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并逐步形成佛



印度贵霜时代佛造像  
公元130年前后出土  
现存马图拉考古博物馆



教早期的两大造像流派。

一般来说，犍陀罗地区的造像由于受希腊、波斯雕塑影响很深，呈现的是与古印度艺术相融合的造型特色，风格明显保留着希腊传统雕塑的韵味，故佛的形象优雅而沉静。秣菟罗风格则更多地体现了印度本土艺术的魅力，其佛像雄健、壮实，胸部宽阔且脸颊浑圆。到了公元四世纪初的笈多王朝时，这种本土化的艺术与犍陀罗风格相互融合，终使印度的佛像艺术达到巅峰期。

造像热潮肇始之初，随着佛教信徒的广泛传播，佛教教义及佛像像又从印度传至东方各国。如，通过中亚，传到中国、朝鲜、日本；通过南路，传到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几乎完整地覆盖了整个亚洲。自此之后，佛像的制造经历了无数次的浪潮与低谷，衍生出众多的流派与分支，一直生生不息地蔓延至后世。

佛教最初的佛像仅集中于释迦佛，即佛陀释迦牟尼的像才称为佛像。但由于历史、地域、民风习俗等因素的影响，佛教逐渐衍生分化为几个相对强势的流派体系，在这些体系下又各自衍生出众多的分支，用11世纪印度佛学大师阿底峡的话说就是：“佛教在番地的发展，已超过佛教故乡印度。”于是，佛像像也发展得既有地域化的特色，又有多样化的特点，所以后世的人们逐渐就把与佛教有关的菩萨、罗汉及诸天像、比丘像等图形塑像全部称为佛像。

据有文字可考的记载证明，佛教是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中原一带的汉王朝地区。佛教传到中原时，首创于印度的佛像像已经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系统的佛教神宗体系，从佛祖到菩萨，从天王到罗汉等，都有较完备的仪容、身态、动作、乘骑、持物等表现规律。正所谓：“禅门有《祖系图》，得佛心印者，皆次列之。”（《北梦琐言》卷四）

中国佛像像的初期表现形式主要是石窟、石雕，所选用的材质自然也就是石头了。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在大自然中只有石头的生命最长久，以石头为材料雕制佛像是能够永存的。中国是世界上佛教石窟艺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其持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广、数量之多，超过世界上任何受佛教影响的国家。可惜的是，那时的人们无法预见到后世毁佛、灭佛的力量有多么强大，更不会预见到时光进入20世纪后，人类制造的空气污染会有更持久的摧毁力。时至今日，当初众多辉煌灿烂的石窟造像早已在盗贼的锤凿下身首异处，伤痕累累；或在腥风酸雨的侵蚀下风化消融，面目全非了。

早期佛教信徒们开凿石窟、雕塑佛像主要是为出家修禅而建造的。禅在梵文中的本义是

西域早期的高昌古禅窟



“静思”，也可解释为“悟”。早在释迦牟尼创造佛教之前，印度的婆罗门教徒就以剃度出家、隐居山林为修禅悟道的主要行为方式。释迦牟尼毅然出家“弃天位，自放山藪”，也是为了远离世俗尘嚣而去参禅悟道，寻求普度众生脱苦脱难之法。在释迦牟尼灭度之后，信徒们虔诚地遵循着佛陀的修行之道，出家修禅随即成为佛教徒的清规戒律。早期的释氏弟子们真的是身体力行地潜心修悟，清心寡欲，餐风宿露，其修行方式在经历了山林旷野自然岩穴的苦修阶段后，逐渐发展为开凿石窟栖身，并在造像禁忌消除后，开始在石窟中雕凿出释迦牟尼的塑像，以求得到佛祖法力护佑。于是，石窟与石造像渐渐在佛教徒修行传道之地流行开来。

中国境内遗存的佛教石窟也是顺着佛教僧侣的传播途径自西向东蔓延发展的。目前在新疆地区古丝绸之路的北路沿线，还能见到古龟兹、古高昌等地早在公元三世纪左右开凿的多处石窟群，其中在库车河出霍尔塔格山口的地方，还散布着早期佛教徒用以修行的各式各样的禅室、禅窟遗址等。不过，历经岁月沧桑，所有建筑早已就面目全非了，只有一些年代较晚的壁画还依稀存在。

之后，石窟沿着河西走廊向中国的腹地发展。

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最早也是沙门僧人自己修行而开凿的。在早年发现的《大周李君莫高窟佛龕碑》上刻着：“莫高窟者，厥载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龕侧，更即营建。伽蓝（佛寺）之起，滥觞于二僧。”

在《法苑珠林》第十三卷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凉州石崖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据有凉土三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终非久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弃，乃顾盼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有土圣僧可如人等，常自经行，初无宁舍。遥见便行，近辄便止，视其颜面如行之状。或有罗土盆地，观其行迹，人才远之，即便踏地，足迹纳纳，来往不住。如此现相，经今百余年，彼人说之如此。”记述的传说虽然有虚拟的成分，但蒙逊主持斫石开窟，雕塑佛像的事实应是存在的。

目前在甘肃永靖县炳灵寺西秦时期第一六九窟中尚留有一条建弘元年（420年）的造像题记，这是中国所有石窟群中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题记。在题记下面，还有比丘像题名“大禅师县



丝绸之路上的古禅窟遗址



摩毗之像，比丘道融之像，法显供养之像”。在《水经注》、《高僧传》等书中记述炳灵寺为“晋太始年（265年）之所立也。”而在《高僧传》中“昙摩毗”的名字被译为“昙无毗”对他的记述是：“时乞佛炽磐跨有陇西，西接凉土，有外国禅师昙无毗来入其国，领徒立众，训以禅道。”

在西域僧人吉迦叶与北魏僧人昙曜共同翻译的《付法藏因缘传》中有这样的描述，“山岩空谷间，坐禅而寃定，风寒诸勤苦，悉能忍受之。”而比两位和尚稍晚些的高允更是在他的《鹿苑赋》中进一步阐释“凿仙窟以居禅，辟重阶以通术”。当时佛界与俗界的人们都把开凿石窟，雕建佛龛看成是通向梵界修炼成佛的唯一途径，中华大地上众多的佛教石窟，也就形成了众多的观佛修禅的僻静空间。

石窟内宁静封闭的环境可营造一种适于宗教联想的神秘气氛，质感强烈的石刻佛像与肉体凡胎的修行者独处一室，能够形成一种巨大的灵魂贯通力，使修行者在观佛悟道中可以通过遐想而与佛进行精神思维的融会交流，在屏息静气、凝神冥思的状态下进入“禅悟”的境界。

佛教僧侣在石窟内建造供奉佛像，主要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表达对佛祖的怀念敬仰，具有纪念意义。第二个就是观想意义。在《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中都曾提到过佛教徒独自在寂静的空间中修行打坐时，经常会感到莫名的恐怖侵袭全身，甚至会毛骨悚然。而观佛念佛，则会消除恐惧，让心灵得到安宁。

在天竺高僧鸠摩罗什翻译的《坐禅三昧经》中，细致具体地描述了观想与修行悟道的因果关系。“若初习行人，将至佛像所，或教令自往，观佛像好……是时便得见一佛二佛乃至十方无量世界诸佛色身。”教徒们从观像开始参禅入定，然后再以心眼观佛相好，便可进入观佛悟道的较高境界，这是教徒禅悟时的普遍修习方式。而在《大集经》、《无言经》等早期经卷中，对这种观佛思佛，与佛融为一体的修炼方式也阐述得比较透彻：“……随天教诲，默然思惟，获得四禅示，如是身则能调伏无量众生，以己愿力，神通道力，令八部四众，各见右手有大莲花，犹如车轮，色香具足，微妙第一，人所乐见一一。华台有一菩萨，结跏趺坐，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无言。见是大神通力，低头合掌，称南无佛陀。诸华台中一切菩萨同作是言。十方恒河沙等世界，六种震动，虚空诸天以妙香花种种伎乐供养于佛，尔时无言，与诸菩萨踊在虚空，高七多罗树，说偈赞佛。”

佛教信徒在塑造佛祖尊像的过程中，不断摸索总结，对佛的五官容貌，身躯肢体及整体形象逐渐归纳出标准化的准则，这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合称即为“相好”。而修行参禅中，时时观佛“相好”，便成为佛教信徒心目中的经典规范。

中国民众的信仰热情自古就非常高涨，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难以计数的世俗民众被佛教教义所感动，从而积极参与投身到敬佛礼佛、拜佛念佛的宗教活动中。这样，石窟空间就远远无法满足信众的需要了。世俗民众的敬佛礼佛与出家僧侣的观佛参禅既有质的区别，更有量的突变，因此石窟的空间容量就难以相容，而固定不动的石刻雕像也难以满足人们观佛的



需求。于是，另外一种环境更为宽敞广阔的寺庙空间就逐渐成为大众观佛念佛的主导场所。这样，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全国各地相继建造起众多的庙宇佛寺，供奉其中的佛造像形式与材质也随着供奉环境的变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佛造像的数量更是随着信众的激增而迅猛激增。

此后若干年，石窟与石佛依然在不断开凿建造，但这时石窟与石佛建造所具有的更多意义其实只是



云冈大佛

僧众们发愿化缘、信众们布施遂愿；或帝王们与信众供养人等自我发愿与还愿的纪念意义了。佛教传播者在宣讲教义时向所有信徒们明示：为佛陀建寺造像是一种功德无量的修行。既然是一种功德，信奉者们当然要积极投入热情参与以求广聚福田。

由于出资布施者来自俗界各个领域，因此，佛造像中帝王或亲属的形象、供养人的形象及其他非佛教界神人的形象等也赫然显现、比比皆是。如，云冈石窟第十六窟的大佛就是比照北魏文成帝的形象建造的。文成帝为使自己的相貌彪炳永垂，曾“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面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魏书·释老志》）操作佛像工程的人为了奉承帝王，把他脸上和脚上的黑痣都原样照搬到佛祖释迦牟尼雕像的身上，就使圣洁庄严的佛教造像融入更多的世俗理念了。

可以这样说：促使佛造像材质多样化的直接原因是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世俗民众的广泛参与。而佛造像的材质与形式也在此时呈现出世俗化、多样化、商品化的发展趋势。

早期佛教造像所选用的材质主要是：石材、木材及黄金、青铜等金属材料。逐渐地，陶瓷、泥胎、夹纆、雕漆、象牙、玉石等各种适宜于雕刻与塑造的原材料也被陆续应用于佛造像中。而遗传至今尚能见到的早期佛造像主要是质地相对坚实的石质与金属材质的作品。



## 第2章

# 佛教传播历程与佛造像兴衰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自古就没有一致的结论。各类著述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却难做考据。其中很多说法无须细辨，即可看出并没有真实依据。如晋宋时期的宗炳（375—443），这位在史书记载中曾远赴庐山参与慧远和尚佛事活动的画坛居士，竟在他撰写的《明佛论》中断言尧舜禹时代的人们就已经知道佛教了。“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国，恨人而爱人。’郭璞传：‘古谓天毒即天竺，浮屠所兴。’恨爱之意，亦如来大慈之训矣，固亦闻于三五之世。”

再如，中国现存最早的佛教文献目录编纂者、南朝的梁僧佑（445—518）在他的《弘明集后序》里也把佛教的传入前移。“《列子》称：‘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来……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观其灵迹，乃开士（菩萨在历代译本中有开士、大士、始士、圣士等多种名号）之化；大法萌兆，已见周初，感应之渐，非起汉世。”

另如，唐代西明寺大和尚玄奘法师撰的《法苑珠林》也有类似的描述。“此土常传：有佛是殷时周昭庄王等造，互说不同，如何取定？答曰：皆有所以。弟子夏桀时生天，具见佛之垂化。”

佛界人士出于种种原因把佛教的历史向前延伸，本可以理解，但如果与历史真实差距略大，就不会有人将其言论当真了。

千百年来，所有研究佛学的人都在探讨这一问题，但是年代距离越远，历史的原貌越扑朔迷离，考证的难度也就越大。如今我们能查阅到的汉语古籍中的记载，不论是汉武帝烧香礼拜金人，还是明帝梦见金人，在这些后人追记的故事里似乎都可察觉到值得商榷的成分。

1998年，中国佛教协会根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释中所引用的《魏略·西戎传》中的一句话，把“尹存受经”的汉元寿元年（前2年）确定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端，并隆重举行了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的纪念活动。

记载“尹存受经”的那句原话是这样说的，“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尹存口受《浮屠经》。”

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转述佛经，是早期佛教经典传承的唯一方式，东汉时译出的一些早期佛经就是通过传诵者口述后记录翻译的，因此大月氏的僧侣来到中原汉王朝口授佛经这个故事是可信的。而若是真能够依此把佛教传入中国的准确时间确定下来，当然是千百年来佛学界与佛学界无数研究考证者的夙愿。此刻，在我的床上堆摊着二十几本记述与佛教进入中国有关的书册，其中既有古人的，也有今人的；既有一些为佛教修史的巨著，也有很多当今佛学专家为





媚俗而用剪刀加浆糊编集的“著作”。逐一看过后，慢慢品味，似乎觉得大部分论述都混淆了中国与中原这个概念，如果仅仅把佛教传到中原汉王朝的时间确定为传到“中国”的时间，那么公元前2年的时间确立也许还是可行的，否则就会在“区域”与“国”的逻辑概念上显得荒疏了一点。

从很多史前史后人类活动的遗迹被大量发现这一社会现象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规律：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一定早于文字记载；而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是无法用文字全面记载的。在佛教何时传入中国这个问题上，这几十本书的作者都在努力仰头上天溯求证，不过所能引用的前人留下的语句毕竟是有限的。试想了一下，若是拓宽视野范围、换个角度，从传播的源头向下追索，沿着历史流源去寻找痕迹，也许就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证据被发现了。

公元前261年，阿育王征服羯陵伽国，这场战争杀死敌兵10万人，俘虏15万人。他虽然取得辉煌胜利，统一了印度，自己却被血腥杀戮的惨烈景象震惊了，起了恻隐之心。随后，他下诏忏悔自责，并皈依佛门，正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阿育王统治时期，印度的佛教达到极盛阶段。他大力倡导造塔建寺，广传佛经，并主持召集了在佛教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第三次大集结。为了弘扬佛法，阿育王曾先后派遣很多僧侣，包括他的儿子和女儿到四面八方去传播佛教，其中就有一部分僧侣直接来到了中国的西藏。这个事件没有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留下记录，或许是曾经有过记录，但已无从查找了。不过，在以巴利文著述的斯里兰卡史书《大王统史》中却有这个事件的记载：“目犍连长老为宣扬佛教，于集结结束之后，预见将来在边境地带树立教法，在迦刺底迦月（夏季八月），把诸长老派遣到各地。派末阐提长老到迦湿弥罗……摩河县无德到摩河勒陀国，摩河勒弃多到奥那国，末示摩到雪山地方……去建立美丽的教法。”书中这一段记载了十个长老带着各自的弟子到不同的地方去传教，其中有些地名可与现在的地域考证对应，有些就要再努力考证了。而末示摩到达的“雪山地方”，就是中国的西藏地区。遗憾的是西藏到公元七世纪的松赞干布时代才有了文字，此前的历史事件就只有从口头传说中寻找了。

汉语古籍中还有个记载也值得注意：公元前138年，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带着100多名部下浩浩荡荡出使西域，这次西行，被史书称为丝绸之路的发端，打通了中原汉民族与西域地区的交通线。当时中国西部地区有三十六个小国，最多时亦曾达到五十多个小国，由于地处中原的西方，所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汉语语境中都把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到中亚、西亚甚至南亚次大陆的地区统称为“西域”。

历尽十三年的磨难后，公元前126年，张骞在唯一的幸存者陪伴下返回长安。司马迁在记述张骞这次西行的见闻时讲了这样一件事，“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印度）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史记·西南夷列传》）

大夏国的人在印度国内买到中国四川商人带去的布与杖……这个故事至少可以说明远在公